

香港傳真

(香港) 桑尼研究有限公司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11-42

2011年7月28日

劉文彩的惡霸地主成份是怎樣被顛覆的？

金仲葵¹

“劉文彩這幾年確實火爆，‘惡霸地主’的名聲早已被顛覆”。這是在上海出版的《解放日報》2011年4月19日的《解放論壇》上說的（此文已於5月由《光明日報》主辦的《文摘報》摘登）。²

上文說的火爆和顛覆，表現何在？

十年來的種種表現暫且不說，單說新出臺的花招吧。

在劉文彩的家鄉四川省成都市所屬的大邑縣安仁鎮上，那堂皇的“劉氏莊園博物館”中，新出現三座才製成的比人身還高的坐式雕塑人像並肩而坐：居中的署名“劉文輝 — 共和國部長”，

¹ 推薦參閱金仲葵執筆：〈剷除封建制度基礎的偉大勝利〉，《香港傳真》No. 2011~4（更新電子版 <http://www.hkstrongwind.com/pdfs/HKFax/No%20HK2011-8.pdf>）。

² 原文見〈附錄〉。

著中山裝；居左的署名“劉湘 — 抗日將領”，戎裝；居右的署名“劉文彩 — 莊園主人”，長袍馬褂，正氣凜然。

好一個“莊園主人”，屬中性詞，一下就把土改中依法劃定的“惡霸地主”成份給顛覆了！

好一個三人並肩而坐，儼然“三人一體”，都是“正神”了！

“劉氏莊園博物館”並非劉氏子孫私人辦的劉氏宗祠，只能對祖宗隱惡揚“善”，捏造吹捧，而是公辦的博物館，當然應實事求是地反映劉氏主要成員的真實面貌。劉文輝將軍起義有功，劉湘將軍抗日有功，均為蓋棺定論，既往就不說了。而劉文彩的真實面貌是什麼呢？是中將清鄉司令（於1928年先後殺害中共宜賓地下負責人李筱文、李家勛等人），是川南稅捐總辦，是1948年7月12日在安仁鎮坐鎮莊園、指揮軍隊襲擊中共川西南地下武裝的總指揮，是9月25日在安仁鎮同慶茶樓上刑訊並下令殘殺中共川西南地下武裝負責人蕭汝霖及其戰友徐達人的元兇首惡。公辦的劉氏莊園博物館為什麼不如實介紹劉文彩的反共罪行，反而多方美化這一罪大惡極的傢伙呢？身兼“劉氏莊園博物館”館長的安仁鎮黨委書記，你到底是姓共或是姓劉呢？同慶茶樓舊址仍在，你們為什麼不在那裡樹立標誌，說明是劉文彩刑訊和下令殘害革命者的地方？莊園仍在，為什麼不說明那是劉文彩指揮剿共的大本營？當今，紅色旅遊盛行，而安仁鎮卻除外。安仁鎮，乃至大邑縣，現在是忌談紅色的，怕牽扯出劉文彩的反共罪行來。

我們，一批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有權利質問“劉氏莊園博物館”館長及有關當局：

1、你們擅自顛覆在土改中依法劃定的劉文彩的惡霸地主成份，有何法律依據？這是不是一種越權和違法的行為？

2、你們百般掩蓋劉文彩於 1948 年還在襲擊中共地下武裝並殘殺其負責人和骨幹的罪行，並加以美化、吹捧，褻瀆烈士，背祖忘宗，是何居心？你們的心是紅的還是黑的？是不是見利忘義、有奶便是娘？你縣一把手和部、局長若干人因經濟問題於去年紛紛落馬，就不會令人奇怪了。

3、中紀委於 2000 年 6 月 16 日以中紀辦【2000】8 號函致四川省委，傳達尉健行同志批示，要求“嚴肅查處為劉文彩翻案的行為”，四川省委、成都市委、大邑縣委都有積極的反應。在此以後，安仁鎮黨委和莊園館乃至大邑當局，為何反其道而行之，並且變本加厲呢？

我們佇候答復和社會反應。

附錄

不要“忘記”蕭汝霖

凌河³

蕭汝霖是什麼人？現在已近無人知曉——這位 20 世紀 40 年代中共川西南地下武裝的負責人，於 1947 年 9 月 25 日在大邑龍門坎被地主武裝抓獲後，經殘酷刑訊，槍殺而死，同時被殺的，還有共產黨員徐達人。那麼這支地主武裝的“老闆”是誰？親自刑訊的又是誰？親口下令“槍殺示衆”的，更是什麼人？原來就是劉文彩。

這是怎麼回事？劉文彩，30 年前已名聞天下，這幾年更是盡人皆知。這不是一個“扶危濟困的大善人”麼？這不是一個“興學建校的開明士紳”麼？怎麼會有這手血債呢——事實上，近年以來為劉文彩“揭秘”的人們，也是心知肚明“蕭汝霖之死”以及自 20 世紀 30 年代以來死在劉文彩這個“中將清鄉司令”手裡的不止十位共產黨人的“舊事”的，可是偏不說，只“揭秘”他的“行善”與“開明”——直到深知川西南尤其是大邑歷史的人明確提出蕭案，“揭秘”者們才承認確有其事，但又說劉文彩當時的“下令槍殺”，是怕蕭汝霖被捕後的口供，會泄露劉文彩“聯共反蔣”的秘密，所以“殺他滅口”——這就是說，為了要“聯共”，所以殺共產黨，一個十分奇特的邏輯。

³ 原載《解放日報》2011 年 4 月 19 日（http://newspaper.jfdaily.com/jfrb/html/2011-04/19/content_553358.htm）。

劉文彩這幾年確實火爆，“惡霸地主”的名聲也早已被顛覆，這自然與“收租院”有關——“收租院”不完全真實，有一些“假”，這可以相信——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為了要“形象”地展示一個道理，結果過於“典型化”，這可以反思，甚至也可以“揭秘”。但是“揭秘”仍然應當是全面的和真實的，如果為了“翻過來”，只講他的“行善”，而有意隱去他的醜跡甚至兩手血債，這就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其實也是另一種“典型化”而已。

關於劉文彩的“行善”，比如建過學校等等，這也是可以相信的。人是“立體”的，地主據說也很“複雜”，也不是一生決無一件“善事”，例如放糧濟困、開校建學這樣的事，“地主”中看來不僅劉文彩一人做過。這是“立體”的一面，我們既不必看不見，也不能由此得出整個封建地主階級是“善”的這樣的結論。就拿劉文彩“揭秘”之後來說，在大邑的劉文彩家鄉，就有一批年近九旬的當年佃戶，出來訴說劉文彩的“大斗進小斗出”、災年的“鐵板租”、特製的“風穀機”以及因為交不出租穀而被“抓人奪佃”的往事，只是這些“揭秘”，因為與時下“揭秘”者的“傾向”不一致，似乎已“不合時宜”，所以竟致於沒有什麼人聽到——我們看見的，似乎只是劉文彩的一片“拳拳善心”。

有一種觀點，叫做“本質論”，意思是說不能因為劉文彩們濟過幾次困、建過一兩所學校，就否認他們乃至整個地主階級的剝削本質，更是說，不能因為在那個特定的時代也有過一些“左”的東西，就否認整個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消滅封建制度的基礎，這本來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任務，可是中國近現代的資產階級那樣軟弱，於是共產黨義不容辭地擔起了領導農民的這

個任務，從而為新生的共和國奠定了制度基礎。這個“本質論”，我看並沒有錯——其實“本質論”誰都在“堅持”，比如有些“揭秘”者通過“揭秘”一個“收租院”進而“否定”對歷史上封建地主階級的否定，這種“微言大義”，難道不是另一種“本質論”麼——如果我們連封建都不要反了，還談什麼今天的改革開放呢？